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民间立场 建设态度 专业视野

# 智库的成长：

## 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探索 之路(2006—2016年)

总主编 周洪宇 潘启胜 万智

本册著者 周洪宇 申国昌 陈冬新

**全球视野 中国立场**  
**专业能力 实践导向**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民间立场 建设态度 专业视野

# 智库的成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探索之路(2006—2016年)

总主编 周洪宇 潘启胜 万智

本册著者 周洪宇 申国昌 陈冬新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库的成长: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探索之路(2006—2016年)/周洪宇,潘启胜,万智总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3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

ISBN 978-7-5564-1257-0-01

I.智…

II.①周… ②潘… ③万…

III.教育事业-中国-文集

IV.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3184 号

智库的成长: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探索之路(2006—2016年)

ZHIKU DE CHENGZHANG;CHANGJIANG JIAOYU YANJIUYUAN DE TANSUO ZHI LU(2006—2016NIAN)

出品人 方平

责任编辑 刘书慧

装帧设计 牛红

责任校对 刘慧芳

责任督印 张遇春

---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a href="http://www.hbedup.com">http://www.hbedup.com</a>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硚口区长风路 31 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1257-0-01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 027-83637493 进行调换)

##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顾问委员会

主任 顾明远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敏 朱永新 刘传铁 杨宗凯 张力 庞丽娟 顾海良 谈松华  
路钢

##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 周洪宇 潘启胜 万智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必学 王池富 方平 方向荣 方晓波 叶平 申国昌 付睿  
付卫东 刘来兵 刘国卫 李梦卿 杨可 何静 佐斌 张炜  
张建林 陈冬新 陈光春 胡明亮 涂艳国 程斯辉 雷万鹏 靖国平  
谭细龙

##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出版委员会

主任 潘启胜

副主任 万智 方平 胡明亮 陈冬新

委员 刘艺 吴龙泉 范正田 李镛 查丹 刘书慧 陈浩 王艳波  
黄烨祁 胡源 付敏 黄裳 刘皖 孙亦君 杨浩 赵欢  
董娟

# 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是提升教育治理水平的重要保障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总序

## 一、建设教育智库是推进现代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

智库（Think Tank）也叫思想库、智囊团，是为政府部门公共决策提供研究、咨询与服务，并通过宣传影响民众的专业机构，有政府“外脑”之称。智库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社会飞速发展，专业不断细化，各个领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部门及决策者越来越难以应付这种复杂情境，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西方各国纷纷成立专业机构，专职进行政策研究，并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相关领域公共政策决策咨询和服务，如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世界范围内也成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下属的各类专门机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以应对世界各国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共同问题。虽然不同的智库在组织规模、运转机制、资金来源、研究专长等方面有差异，但它们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即都试图影响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

教育智库作为智库的一个重要类别，在教育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世界上最早的教育智库是1905年成立的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教育智库是以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以教育专家为主、跨学科专家为辅组成，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在处理教育方面问题时提供专业的思想、理论、策略或方法等。

“治理（governance）”一词，由世界银行于1989年首先使用，现今已成为政治、教育、医疗、卫生等公众领域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调和不同利益冲突、形成联合活动的过程。这一概念被引入教育领域之后，教育宏观管理呈现出崭新面貌。教育治理成为一种新兴范式，立足于解决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病与不足。教育治理的主旨在于多主体共同平等参与对教育事务的管理，各类教育利益诉求将得到充分表达，各类意见、主张及争议都能得到充分展示、理解与包容。

教育毋庸置疑是公共领域，随着当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教育治理的架构和机制也在发生变化，治理结构从等级制向网络化转变，治理主体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

变。“治理”与“统治”“管理”最根本的区别是行为主体的不同，教育治理不仅仅由政府承担，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企业、学校、家长等也成为教育治理责任的共同承担者。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等在内的教育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到教育治理过程中来，协同治理教育领域的各项事务，在机制创新、规则制定、规划实施、资源投入、监督评价等方面相互协调。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建设教育智库是推进现代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是提升我国教育治理水平的重要保障。要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必然要求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

## 二、研究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是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首先，研究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是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发展教育智库、推进教育治理的时代命题。G20 杭州峰会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为主题，强调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已站在全球治理舞台中央，当前的形势迫切需要中国智库承担起时代重担。在教育方面，教育智库和教育治理正在成为一个亟须开拓和深耕的领域。

一个国家、民族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领先权、决胜权，除了有优越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外，还必须拥有众多的高水平智库。因此，世界各国日益重视智库建设。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 21 世纪，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大规模普及与运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人类在享受当代物质文明的同时，面临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冲突、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健康问题、宗教问题、教育问题等日趋综合化、复杂化，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及作用显得愈发重要。中国于 2015 年年初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标志着中国的智库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和富有实践经验的原从政人士等为主体人员的各类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提供咨询、影响决策、推动改革发展、参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阐述“发展主线”时指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我国教育领域当前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制约，即多样化、高质量、能满足人们需求的教育供给稀缺，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立足当前我国教育面临的紧迫形势，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教育智库能为当今我国教育治理贡献什么？能在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和发展进程中起什么作用？

从国内需要和国外经验来看，教育智库将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一支坚实力量，它在教育政策建言方面可以发挥智库的咨政作用，贡献独立和客观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促进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在交流合作方面可以发挥智库人才优势和专业特长，增进与国外教育同仁的交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教育合作模式；在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中可以发挥教育督导和评估作用，维护教育评估的公正秩序，并以此为“突破口”，促进我国教育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轨。

眼下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正向纵深推进。教育事关千家万户，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人民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领域之一，政府部门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需要开放性和包容性，要做出科学的决策，必须依赖深入、扎实且“接地气”的科学数据分析，因此，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呼声越高，越离不开教育智库的建言献策。

当前，我国的教育智库在政府教育决策、教育改革、传播教育价值等方面的参与程度和力量贡献仍有待提高，在未来仍需要继续推进我国的教育智库建设，进一步发挥教育智库自身的优势，负起时代重担。

其次，研究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促进现代教育治理的客观要求。

提升教育治理水平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我国的教育治理体系能否通过自身的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关乎“十三五”战略目标能否圆满完成，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教育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业型智库，是以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就世界范围来说，如何更好地参与和实施教育治理，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是当代各国教育智库发展面临的共同命题。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要借鉴国外优秀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遵循智库建设的规律，按照自身的运行特点，明确职能任务、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我国的教育智库应抓住机遇，顺势所趋，主动作为——不仅要在推销思想、塑造公众舆论方面加强各种举措，使我国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等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而且要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教育治理规则，增强在国际教育媒体和国际组织平台的话语权，把我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主张有效传播出去。在联动包容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中，既要体现大国担当，又要彰显中国立场和中国智慧。

当前，我国的教育智库“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例如在推进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智库、高校与政府三者的定位和边界有趋向模糊甚至彼此代替的趋势。按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的总定位，教育智库“创新理论、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的基本定位，以及我们所理解的“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具体定位，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治理的客观要求，必须继续加强中国特色教育智库建设。以新型智库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我国的教育智库目前还有很大距离，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努力打造国家“信得过、用得上、想得起、离不开”的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

最后，研究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把它作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定位和新的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也对我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这一切都深刻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型智库事业的信任、支持和厚望。教育部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2014年3月，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从多个方面对高校智库建设给予了明确指导。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意见提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3年1月31日的全国教育科研工作会上，对新型教育智库（包括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功能也曾作明确规定和阐述，那就是“创新理论、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具体来说，就是探索教育规律、创新教育理论；提出政策建议、服务教育决策；开发教育策略、服务教育实践；引导教育舆论、更新教育观念。这些对教育智库建设都有重要启示。



中共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为智库专家参与决策咨询开辟了广阔空间，为各类智库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等方面都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智库支持。

中共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提出明确要求，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具体在教育智库方面，就是要重视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以促进教育智库建设，提升教育治理水平，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治理的客观要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好地培育培养各方面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充足而强大的教育人力资源支撑。

### 三、编写出版《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是长江教育研究院落实中央指示，发展教育智库、推进教育治理的具体举措

长江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长研院”）成立于2006年12月16日，迄今整整十年。它是为了贯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关于整合省内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湖北教育与文化产业的指示精神，在湖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发起，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的，聘请我担任院长。它立足湖北、辐射全国、面向全球，开展教育政策研究、提供多种教育服务，努力探求一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教育服务为支撑、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和社会支持为后盾，“学、研、产、政、社五位一体”、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机制。这种研究机制与运行模式立足中国现实国情和实际情况，试图走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新路，形成自己的特色。长研院成立十年来，通过新机制，凝聚了顾明远、陶西平、郝克明、朱永新、谈松华、张力、孙霄兵、劳凯声、庞丽娟、杨东平、曾天山等一批享有盛誉的知名教育专家以及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英特尔教育总监朱文利等中外知名企业研究机构负责人，开展了多项有影响的活动，编写出版了一批重要成果，为湖北及全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努力。

长研院自2006年成立以来，尤其是2009年以后，每年3月初全国“两会”前都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专门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专家学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官员举行教育问题座谈会，并借此发布长研院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一般是围绕一个主题，提出10条左右建议，反映教育界和关心教育的社会人士的心声，并由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重要建议通过全国人大提交给有关方面办理，其中一些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许多建言都

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我还有幸作为代表性人士被邀请到中南海参加教育问题座谈，直接向中央领导建言，推动教育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长研院还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出版年度《中国教育黄皮书》，对该主题情况进行总体分析，提出改进意见，并对当年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进程作出回顾、反思与总结，迄今已连续出版7册，成为颇具特色的系列教育黄皮书，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并于2014年10月获得《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2016年3月又首次在京发布“中国教育指数2015”，从规模度、投入度、质量度、公平度、贡献度、信息度、开放度、创新度、创业度等维度，对全国的教育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和监测，提出改进建议。根据长研院“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准则，编辑出版《长江教育论丛》，为长研院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新的学术成果发表园地，它与长研院已有的年度《中国教育黄皮书》、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年度教育论坛互为增援，相辅相成。

2015年以来，面对近年来国际智库的蓬勃发展，中国崛起后对智库建设的迫切需要，以及中共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建立中国特色智库的明确要求，长研院力求新形势下的转型升级发展，逐步将自身的定位，由原来的“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产品研发”发展到“教育政策研究智库、教育产品研发基地、教育咨询评估中心”，由原来的“一体（教育政策研究）一翼（教育纸质产品）”发展到“一体（教育政策研究）两翼（教育多媒体产品和教育咨询评估）”，由原来的“学、研、产、政一体化”发展到“学、研、产、政、社协同化”，由原来的“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发展到“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由原来的地方化、区域化发展到全国化进而国际化，开始迈上一个新台阶。

长研院在十年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为了提升自身能力和更好更健康地发展，必须以“教育智库”为担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主要目标，以“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为基本原则，树立自身的责任意识，建设有特色、质量高、竞争力强、影响大的教育智库形象。为此，借十年院庆之机，从2015年5月开始，专门组织院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撰写出版《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摆在各位读者面前的就是大家辛勤努力了一年半的结果。

全套丛书一共10种，从主题和类型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国外教育智库研究，重点是对成立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成效最显、影响最大的美国教育智库进行研究，全面考察其兴起原因、发展过程、运行模式、基本特征、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和未来走向，为中国教育智库建设提供借鉴，这方面的论著包括《国际思想库：国外教育智库研究》（周洪宇、付睿、邓凌雁著）、《智库的作用：以美国卡耐

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为例》(周洪宇、邓凌雁著)、《大学新智库：以美国大学教育智库为例》(郭伟编著)等；二是中国教育智库研究，试图系统分析中国教育智库的产生背景、客观环境、发展历程、主要任务、运行模式、成绩不足和发展趋势，为教育智库今后的健康发展作参考，这方面的论著包括《智库的转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转型发展》(付卫东、付义朝著)和《新智库指数：中国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指数与绿色指数》(张炜、陈光春著)等；三是长研院自身研究，即对长研院十年成长过程进行回顾、反思与总结，介绍其建言献策的情况及其产生的效果，探讨今后的健康发展道路，这方面的论著包括《智库的成长：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探索之路(2006—2016年)》(周洪宇、申国昌、陈冬新著)、《智库的力量：长江教育研究院历年教育政策建议书(2009—2016年)》(周洪宇、胡明亮、张建林编)、《智者的建言：长江教育研究院顾问专家国是建言集》(周洪宇、杨可、方平编)、《智者的声音：长江教育研究院院内专家国是建言集》(周洪宇、刘国卫、刘来兵编)和《智库与治理：周洪宇国是建言》(周洪宇著，上、下卷)等。该丛书依照从宏观到微观、从总体到个案、从理论到实证、从转型到创新、从国外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从当下到未来的思路布局，回顾历史，关注现实，着眼未来。在参与这套研究丛书编写的专家学者中，既有年逾八旬的资深专家，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术骨干，还有充满活力的学术新锐。我的考虑是，长研院不仅要出一套该领域带有某种原创性的学术著作，也要带动和产生出一批教育智库和教育治理研究的优秀专家尤其是年轻人才，他们将是我国学术界的未来希望。

由于长研院的上述工作带有很大的探索性，很少有前人的成果可作依傍和参考，大家只能边思考、边研究、边撰写，考虑或有不周之处，编写或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专家指正。

再次向十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长研院发展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感谢，向一直参与长研院研究和讨论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谢意，向始终一起患难与共、坚守阵地、不离不弃的各位院内同志表示最大的敬意，向积极支持《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出版工作的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谢忱！

周洪宇

2016年11月10日于东湖之滨

# 序 言

## 一、时代背景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和富有实践经验的原从政人士等为主体的各类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提供咨询、影响决策、推动改革发展、参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

中共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为智库研究提出了法治时代的新命题，为智库专家参与决策咨询开辟了广阔空间，为各类智库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都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智库支持。

当前，教育领域改革正向纵深推进。教育事关千家万户，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人民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领域，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需要开放性和包容性，做出科学的决策，必须依赖深入、扎实的且“接地气”的科学数据分析，因此，教育领域的深化改革呼声越高，越离不开教育智库的建言献策。

教育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业型智库，是以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当前，教育智库“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以新型智库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还有很大距离，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努力打造国家“信得过、用得上、想得起、离不开”的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

教育智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理应树立自身的责任意识。建设有特色、质量高、竞争强、影响大的教育智库，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注重发挥高校教育领域专家的专业优势，从顶层设计上提供智力支撑。在

教育发展过程中，常常有一些出现在教育领域里的问题，看上去是个教育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就需要从单纯教育专家到社会家的角色转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核心作用，组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咨询团队，为教育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二要注重加强高水平政策研究，不能浮于政策的阐释而失去了创造性，忽略中国国情的纯学术化倾向和不接地气的唱高调和空谈。教育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要出思想，谋战略，特别是在一些前沿应用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针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和重大教育改革问题，既立足于专业发现问题，又从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全局展开研究，提出高水平政策建议。

三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态度和工作方式。教育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常常相互联系，互相交叉，错综复杂。弄清这些问题的性质和成因，辨清这些问题的真假，对教育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关键在于“转智成治”，让国家“信得过、用得上、想得起、离不开”。这就需要教育智库以改革发展重大战略问题为研究核心，主动开展战略谋划、综合研判，为政府提供及时、解渴、解困的决策智力支持，积极推动决策咨询成果向公共政策转化。

四要注重构建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提高教育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建立教育智库创新协同机制，围绕社会和人的需求，探索融合“政、产、学、研、用”于一体的高效的协同创新模式，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才能推进智库战略咨询取得新成效。

## 二、成长历程

成立于2006年12月16日的长江教育研究院，是高等院校、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型企业集团联合创办的一所以研究教育政策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机构。其成立的直接缘由，是为了贯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关于整合省内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湖北教育与文化产业的指示精神，在湖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长江出版集团联合发起，由长江出版集团承办的。

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成立有个特定的背景。2006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原省教育厅有关教育图书报刊资源划转到文化部门管理之后，为防止教育资源闲置浪费，要求进一步整合省内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湖北教育与文化产业。根据这个重要指示，时任教育厅路钢厅长与时任华中师大校长马敏、长江出版集团负责人等研究落实措施，三方协商决定由时任教育厅分管教育政策和省教

育科学研究所、对接武汉地区高校教育研究工作的副厅长周洪宇（本身也是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负责具体落实工作，由此建立长江教育研究院以具体推进此事。

尤其是2008年2月周洪宇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担任副主任之后，受命继续协调推进此项工作。2009年3月至2014年底，长江出版集团进行转企改制为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并成立上市公司“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后，周洪宇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秘书万智以及时任股份公司教材中心研发总监陈冬新等人，先后赴北京专程看望国内教育名家顾明远、郝克明、陶西平、谈松华等，争取其大力支持，每年3月初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召开前，都联合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研制与发布长江教育研究院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还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工业大学、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省教学研究室等专家学者编辑出版年度《中国教育黄皮书》，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议案与提案，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创新。

2015年以来，面临近年来国际智库的蓬勃发展，中国崛起后对智库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共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后，中央对建立中国特色智库的明确要求，长江教育研究院力求新形势下的转型升级发展，逐步将未来的定位，由原来的“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产品研发”发展到“教育政策研究智库、教育产品研发基地、教育咨询评估中心”，由原来的“一体（教育政策研究）一翼（教育纸质产品）”到“一体（教育政策研究）两翼（教育多媒体产品和教育咨询评估）”，由原来的“政、产、学、研一体化”到“政、产、学、研协同化”，由原来的“民众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到“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由原来的地方化、区域化到全国化进而国际化、全球化等，开始迈上一个新台阶。

### 三、主要贡献

民间教育智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理应树立自身的责任意识，建设有特色、质量高、竞争强、影响大的教育智库。

长江教育研究院最初定位于国内民间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目标是“立足湖北，辐射华中，影响全国”，后来这个定位与目标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有了很大的调整与发展。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长江教育研究院最初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也就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要建立的有

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智库。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这个意见公布出来，可见其重要。

换句话说，十年前长江教育研究院其实就已在开始做中央想做的事情，只是当时人们做这个事情是不自觉的，有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新型社会智库、一个民间教育智库。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现实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来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与创新，当然首先是通过湖北进而带动全国。十年来，通过其工作和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的目标，当然与理想的目标还比较远，还应继续努力。

长江教育研究院的作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出思想，出人才，出产品，出效益”。研究院成立以来，在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研究院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通过探索新的研究机制，组建了一支队伍，凝聚了一批专家，明晰了方向和重点，开展了课题研究。在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资助下推出了一批成果，特别是持续开展教育政策研究活动，为湖北地方教育乃至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以及人才培养作出了积极贡献。

长江教育研究院十年来主要做了如下几件工作：

一是每年3月初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在北京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到会的有国内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既有教育部的重要官员，一些重要司局的司局长，也有教育部下属两个最主要的研究机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领导。国内教育研究的主要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主要的民间教育研究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等领导与学者都会参与会议，一些特邀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也会应邀参会，了解社情民意，以作为向“两会”提交建议议案提案的重要参考。可以说，每年3月初在北京，在全国“两会”前，都会以长江教育研究院的名义，召开一次高端教育座谈会。通过这个座谈会把长江教育研究院的声音发出去，通过这个会议影响“两会”和“两会”的代表委员，吸引他们关注教育，关注教育当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有关的政策。

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的前两年，在举行“北京·长江教育论坛”时，还没有开始发布自己的《教育政策建议书》，从2009年开始发布《教育政策建议书》，并由此逐渐对国内教育政策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因为2008年中央开始启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2009年3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即将出台、广泛征求意见之际，长江教育

研究院为此专门发布自己的《教育政策建议书》，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这一条中，建立国家教师统一资格考试制度、统一城乡教师编制制度、实行教师合理流动制度、实施教师定期考核及退出制度等具体条款，后来都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采纳，而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或者说“特殊公务员”“准公务员”），具体地说就是将公立中小学教师确定为“国家教育公务员”，以增强教师的吸引力、提高教师的地位、确保教师收入稳定增长，并为未来实行教师合理流动制度奠定基础。这是长江教育研究院的一条重要建议，最初也被吸纳进去了，在2009年6月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6稿之前还保留在内，但是很遗憾，后来在征求各个部门意见过程当中，有关部委提出了不同意见，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博弈，这一条终究被拿掉了。虽然，国家960万公立中小学教师至今尚未被确立为国家教育公务员（“准公务员”），留下了问题，但也能看出来长江教育研究院当初的努力，以及未来继续争取的建议空间。

又如，教育改革要从地方做起，支持地方教育的探索创新，比如应在广东深圳等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若干“教育特区”，积极支持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新之举，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之路。这是长江教育研究院在吸收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后，在2010年教育政策建议书里明确提出来的，也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在2011年5月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的“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再次提出来，引起大家的热议讨论。次年，深圳的《南方教育时报》为此举办专题讨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等专家发表意见，形成一个热潮，不少地方更加重视教育创新，以区域突破带动教改全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很明确地提出要支持地方和基层的创新。

再如，2013年长江教育研究院放眼世界，敏锐地发现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向人类社会扑面而来，作为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机会的全球发展的后起者，中国必须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新的历史性大变革中，未雨绸缪，及时应对，加快教育变革与人才培养步伐。根据这个判断，2013年3月全国“两会”上，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式向全国人大提交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及中国教育的应对之策”，这是国内第一家教育智库向官方与社会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及中国教育应对之策建议的，就是放在3年后的今天，这份教育政策建议书的观点与主张仍富有前瞻性和引领性，值得引起社会各界更大的重视。

此外，2014年3月全国“两会”上，长江教育研究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改革”的10条教育政策建议，引起了分管教育



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等同志的高度重视。“两会”期间，中央领导特邀七位有代表性的“两会”代表委员到中南海参加教育改革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还特别安排全国人大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同志第一个发言，听取他对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改革、加快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意见，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也在这份教育政策建议书上作了重要批示，这都说明“关于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改革”的这份教育政策建议书，是适时的，其现实性和针对性都很强，也富有可操作性。

上面举的几个例子，说明十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教育政策建议是有远见、有高度、有厚度、有成效、有影响的。

在“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长江教育研究院每年都会发布教育政策建议书，一年一个主题，每年都会围绕一个主题提出十条左右的建议，从2009年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建议、2010年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到2013年第三次工业革命及中国教育应对的建议、2014年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的综合改革、2015年对教育法治建设的建议、2016年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每次发布教育政策建议书后，这些建议也都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提交给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反映到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来推动工作的进行。

二是出版年度《中国教育黄皮书》。这个与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不同。“教育政策建议书”是没有公开出版的，而《中国教育黄皮书》是公开出版的。通常《中国教育黄皮书》的上半部分是上一年的“教育政策建议书”以及在这个教育政策建议书的推动影响下国内专家学者的响应、研究以及实践推进，下半部分是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年度发展状况报告。它是综合性的，既有年度主题，又有年度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年中国国内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进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教育研究院的年度教育政策倡导及其产生的效果。

三是《长江教育论丛》的编辑出版。这项工作是从2015年开始的，半年刊，每年分春秋两辑。《长江教育论丛》是一个学术性杂志，与长江教育研究院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和《中国教育黄皮书》的定位不同。“教育政策建议书”是一年一度的政策建议，带有前瞻性和引领性；《中国教育黄皮书》是一年教育的总汇，带有总结性和年鉴性。而《长江教育论丛》是学术性的。三者构成一个从学术到现实到未来的三维系统，三足鼎立，各显其能。未来根据研究院的设想，还要陆续推出一系列